

•《参考消息》专辑12

举世瞩目的 伟大试验

—— 外国报刊谈中国改革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参考消息》专辑之十二

举世瞩目的伟大试验

——外国报刊谈中国改革

主 编 杨效农

责任编辑 邓辉政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一九八五年十月

编 者 的 话

中国的改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个伟大试验。这一改革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来，逐年深入，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而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发展，国际上对它的研究、评论也在不断深化。这种深化既反映了外部世界对我国改革的研究和看法的发展，也检验了我国改革在外部世界引起的关注及影响的变化。

这本专辑选登了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至一九八五年十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一年间，一些外国知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撰写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四十二篇。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也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他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改革的意义、成果、影响、问题和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评论和描述。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除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工作外，也涉及到军事、教育、社会等方面，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年来国外，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改革研究的深度及其基本看法。

这本专辑所收集的文章大部分是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在编排上，大体是按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同时也兼顾文章内容。文内有些引语和中国人名一时难以查对，采取了译意和译音的做法，请读者见谅。翻译和编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指出，以资改进工作。

一九八五年十月

录 目

中国的道路·····	(南) 德·兰契奇 (1)
中共三中全会——更接近于生活·····	(南) 卓·拉登科维奇 (3)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改革·····	(墨西哥) 《一加一报》 (5)
全世界都注视中国的变革·····	(美) 夏洛特·赛科夫斯基 (6)
中国经济调整时期的宏观经济变化·····	(美) 叶孔嘉 (9)
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验·····	(日) 小林实 (28)
中国伟大实验的前景如何·····	(日) 《经济学人》 (33)
中国加入国际行列：前景和影响·····	(美)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41)
中国经济预计会迅速发展·····	(美) 《商业日报》 (56)
中国的新经济战略·····	(美) 简·普赖比拉 (57)
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	(苏) 斯切潘诺夫 帕尔佳科夫 (68)
中国的经济改革·····	(捷) 埃·多尔洛娃 (79)
中国的资本主义与众不同·····	(芬) 维尔霍·哈尔莱 (85)
世界银行列出中国的选择·····	(英) 阿兰·卡斯 (89)
纽约《知识分子》专刊：中国改革之路·····	(92)
改革的历史意义·····	(美)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93)
农业改革·····	(美) 德怀特·珀金斯 (100)
城市改革·····	(美) 罗伯特·邓伯格 (108)
回顾与展望·····	(美) 哈里·哈丁 (117)
中国信息化战略的全貌·····	(日) 增田祐司 (125)
中国的计划—市场机制·····	(联邦德国) 诺贝特·克洛滕 (129)
价格改革会引起通货膨胀吗？·····	(美) 王波 (136)

中国的道路

南斯拉夫《政治报》前驻北京记者 德·兰契奇

原文提要：中国在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方面决心进行最伟大的试验。中国的改革是革命性的。毛以后的中国迄今所发生的变化速度之快使人们产生了希望：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中国果断地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再是按照继承下来的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吃大锅饭和僵化的国家管制的社会主义了，而是一种尊重商品生产、生产者的倡议、市场竞争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社会了。

中共中央这项最新决定尽管只涉及经济领域，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在其社会主义改革中在政治思想上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

中国在探讨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时遵照了武装革命时期的特点，这就是象过去一样先解放农村，然后再包围城市。经济改革也是如此，首先从解放农民开始，使农民摆脱强制性的集体化遗产，然后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开始扩大到城市中的国营经济部门。

中国领导把现行制度的主要缺点归纳为如下几点：政企职能不分，各地区之间存在条条块块，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未给予足够重视，而在分配领域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

迄今为止，中国人提到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经济改革的两个前提：通过给予生产者更大自主权和责任来改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中央、省和生产地区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把重点放在了改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上面。从明年一月份开始，国家将不再决定受它管辖的全部产品的一半产品的价格。新的物价将根据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情况形成。

在改革物价体制的同时还宣布也将改革工资制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这两种制度就是平均主义的泉源。

今后五年中，当在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的一百万个国营企业中实行改革时，预计将有四分之三的中国经济部门可以摆脱严格的计划监督。

还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已故孙冶方曾大胆地说过：在人类的活动中可能存在着成千种规律，但价值规律是第一位的。今天价值规律的运用已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过去社会主义曾同吃大锅饭政策混为一谈。今天则说，共同富裕并不等于，而且永远也不等于绝对平等。过去曾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今天则认为，竞争是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贯彻多劳多得原则的前提。

中国采取的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不会没有风险。运用价值规律亦即意味着缩小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巨大剪刀差。这实际上意味着，八亿农民必须为他们的劳动付出更大代价。现在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补贴已超过了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这就必然需要对工业品和农产品实行经济价格。而实行经济价格是一般社会主义经济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低工资和国家补贴大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日常生活必然变得昂贵起来，必然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差别和地区间的差别，造成关闭非盈利企业，造成更大通货膨胀等等。

然而，这是中国同遗留下来的经济信条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清算。正如国家对外开放时所得出的结论——在闭关自守状况下不会取得进步，也不会实现现代化——一样，现在中国人在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时也得出结论：不充分尊重人的劳动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和尊重市场规律作用的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喜欢将自己理想化，这是中国已亲自尝试过的，后者不断地迅速进行改革并同更先进的国家相比，人们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中国抱着巨大的批判态度对待它所希望改变的东西。下列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的这种选择是勇敢的，即中国有十亿多人口，而且它不久才刚刚摆脱了如下这种信念：最通常的农村集市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而今天谈论的则是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忽视市场，任何计划都意味着脱离现实。

中国正在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放弃过去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寻求自己的道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中国

人在实现自己的愿望时在思想上和实践中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第三次大飞跃”。实质上，“第三次飞跃”是中国社会主义存在三十五年来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中的最伟大的行动。

中国的勇气无疑表现在它制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决定方面，因为中国决心在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方面进行最伟大的试验。中国的改革是革命性的，而这种改革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它常常会出现起伏。然而毛以后的中国迄今所发生的变化速度之快使人们产生了希望：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这种希望正是新的自信心的基础。

（原载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共三中全会——更接近于生活

南斯拉夫《政治报》驻北京记者 卓·拉登科维奇

原文提要：全会通过了关于重点放在城市经济的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具有历史性意义。强调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和企业自主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会。会议一致通过了纲领性文件《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同时还决定明年九月召开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将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

出席全会的有三百二十一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二百九十七名列席代表。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和陈云主持了会议。全会前曾举行了六天预备会议，会上显然讨论了今天通过的决定。

按照惯例，全会公报在全会结束后才发表。但与从前不同的是，这次中国领导人预先就宣布将召开中央全会，并宣布了全会将要讨论的问题甚至召开会议的大概时间。

一步一步走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学习《关于经济改革

的决定》，要“好好工作，充满信心和鼓舞斗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特点是：它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至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最近几年的经验，确定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强调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对外开放和加快以城市经济改革为重点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自然，文件并没有提出具体措施，具体措施将留在今后在实施五年计划期间再去逐步制订，文件只是勾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战略。

在以《改革的迫切性》为标题的第一章中说，农村新政策的伟大成就同时要求工业和城市中的其他经济部门进行深刻的改革并为此创造适当条件，说“我国城市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很低”，应该使经济体制能够应用世界最新技术革命的成就。进行越来越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希望这次会议的决定将起到“历史性作用”。

给企业“松绑”

文件进一步强调指出，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民主和精神文明的、强大的、繁荣富强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已经奠定，僵化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因为下面这些主要缺点妨碍了这一点：政企职能界限不清，各地区和机关之间存在许多条条块块，国家对企业统得太死，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没有消除。

在列举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时，首先提到要给企业“松绑”，并提到中国现在有一百多万个城市工业企业、建筑企业、运输企业和商业服务企业，这些企业中就业人数超过八千万人，工业劳动组织的税收和利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五分之四。今后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并接受国家监督的同时，在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将拥有更大权力，并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与此同时，要保证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

物价体制中的“混乱现象”

文件规定将建立一种“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能自觉运用价值

规律”的计划体制。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的产品仍由国家制定具体计划。将更多地运用总的计划指标调节生产，而一系列商品将通过市场作用自由调节。

文件指出，在目前确定物价的体制中存在“许多混乱现象”，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忽视了价值规律，以及“其他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改革现存不合理的物价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纠正这一状况时要特别注意不要降低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不要造成通货膨胀，同时要注意企业应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而不能靠提高产品价格增加经济收益。

在城市经济部门中十分重要的方针是建立具有鼓励性的“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在农业中已取得巨大成效，要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同时责任制要以灵活的和现实的方式去适应城市经济的特点。文件坚决强调“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

肯定能成功

必须发展各种经济形式，国营小企业要承包给集体和个人，要在独立自主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开展同外国的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经济部门中十分缺乏懂得现代经济、技术和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因此，中央号召到一九八五年底要在企业领导岗位，尤其是关键领导岗位上换班。

必须坚决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威信，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将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并为建设高度文化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条件。

（原载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改革

墨西哥《一加一报》

为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坚持不懈努力的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一个庞大的、彻底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家经济结构改革计划。

这次重要会议特别指出了它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主要弊病的问题，其中占突出地位的是统得过死，妨碍了企业自主权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因此，现在决定明确规定政府在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方面应有的职能。会议还认真讨论了妨碍生产活动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平均主义问题。中国领导人重申了在进一步彻底纠正毛主义时代的错误的情况下，重新评价知识分子劳动的原则，他们要求坚决克服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

但是，这场向世界宣告的改革，要迅速实施以便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成效，其规模和速度必须适应这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复杂现实。这个现实就是，那里存在的有待解决的巨大问题，以及它与同样复杂危急的国际现实的相互关系。这些如此大胆的目标，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将作出新的努力，并具有一种惊人的不断更新的推动力。因此，改革的成败，将取决于人民的参与，即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化。

（原载墨西哥《一加一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全世界都注视中国的转变

新的经济竞争会影响许多方面的关系

（美国）夏洛特·赛科夫斯基

提要：美政府内外专家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可能使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将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化国家出现，并为更广泛的世界经济合作提供机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得到加强。

当印度力求实现其政治稳定时，美国仍然在注视着人口稠密的亚洲的另一个地区，在这里，一场引人注目的范围广泛的改革正预示着世界秩序的新时机和新的挑战。

这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正在进行旨在把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许多东西注入共产主义制度的大胆的工业改革。这里认为，这场改革是国际舞台上一项意义重大的发展。

政府内外的外交专家们认为，这场改革有几种含义。由于实行使其

更接近世界经济体制、允许中国人民有较大自由的市场调节制度，中国有可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

如果改革成功，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化国家出现，将会为更广泛的世界经济合作提供机会，并促进一种有秩序的贸易体制。它还会影响诸如越南和北朝鲜这样的共产党国家的发展格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得到加强，从而使其邻国，首先是苏联更为担心。

莫斯科将会对北京既羡慕又担心：羡慕，是因为它也急需改革它的经济体制，然而却又害怕这样做。担心，是因为中国在其成为大国的进程中可能会取得成功。

一位国务院官员说，“从在……经济政策上正在发生的情况的角度上一个一个地国家地观察一下整个世界，我们现在看不到还有任何其他地方象中国这样富有更大的活力。”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专家哈里·哈丁说，“邓象毛一样把中国翻了个个儿，采取的办法大概会继续下去。”

哈丁说，“这些改革思想并不是新思想。但是意义在于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些思想。从这次改革是否会持续下去上看，这意味着，在邓百年之后改革将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增加了。”

专家们提醒说，改革将会遇到可怕的困难。哈佛大学专家德怀特·珀金斯说，一个问题是一批政府官僚将会起来反抗，这些人现在掌管着经济，但由于他们没有受到新制度的训练而面临失去权力和地位的危险。

通货膨胀肯定会出现，特别是如果允许城市中的食品价格上涨的话。现在是国家给予补贴，人口的压力将会继续存在，有可能在城市中引起爆炸性增长，此外，中国还可能遇到能源危机。

珀金斯仍表示乐观，认为改革会持续下去。中国每进行一次改革就是“朝更多的改革稳步前进。”

中国的改革对莫斯科的影响引起了分析家们的兴趣。苏联报纸《真理报》已经表示不赞成这种改革。

但是，开明的苏联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苏联实行改革，这些改革将以中国采取的方式解放其人民的创造力。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敢对保守的克里姆林宫说，如果不进行改革，苏联就有落后的危险。外交

专家和学术专家们说，苏联人对形势发展作何反应可能取决于国际关系形势。如果情况仍然是比较温和的，苏联的那些希望奉行比较合理的政策的人可以认为“中国的经验使社会主义顺利进行”并要求进行类似的改革。

这些专家们说，但是，如果世界形势对苏联人具有威胁性，他们很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进展以及美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大感到惊慌。他们感到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因此甚至可能会采取一些不理智的行动。

专家们说，苏联人之所以难于改革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因为他们的民族目标同中国人的不同。

中国对它的文化是有自信心的，它主要想成为一个大国，苏联最关心的是安全和控制——如何同外界做斗争和如何保持内部的团结。经济不集中会造成问题，因为这样做有失去对苏联辽阔的领土的控制的危险。

虽然中国的改革可能会使苏联人感到踌躇，但是哈丁博士确实预料，在近期内会对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哈丁说：“这并不预示对中苏关系不利或对中美关系有利。中国设法做的是同俄国人恢复外交对话，缓和紧张局面，同时继续偏向美国。”

随着中国进行其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分析家们指出，一个依靠出口的富有生机的中国经济可能会有朝一日使贸易竞争更为激烈并促使形成保护主义浪潮。但是，一个经济上合理一些和自由一些的中国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将来会遇到的问题更为重要。

珀金斯博士问道：“你是愿意再出现一个日本呢，还是再出现一个苏联？我们的选择是要一个繁荣的、纳入世界系统的中国呢，还是一个对外界持猜疑态度的孤立的强大的国家？”

（原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

中国经济调整时期的宏观经济变化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 叶孔嘉

提要：文章概括了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介绍了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的背景和特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

认为我国近几年和五十年代相比，政局稳定，外国技术大量流入，实行讲求实际的经济政策，两个时期的产出增长率大致相等，但是，在人口规模、加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以及发展战略方面有区别。

认为近几年来，我国人均生产增长率比过去几个时期高得多；产出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工业的转变，但农业所占比例仍然很高，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我国的积累比例仍相当高，增长的潜力来自有效地使用投资，而不是进一步提高积累比例；我国经济越来越向世界开放，今后将继续实行面向外部的发展战略。

说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调整，但是，今后经济改革将成为一个中心问题，体制改革可能会比调整政策困难得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本文要考察的是一九七八年以来主要的发展政策和明显的经济发展趋势，并对今后发展的前景作出估计。

第一部分概略地叙述一下影响当前经济政策和经济情况的七十年代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第二部分扼要谈谈新的发展战略，并同过去的战略进行比较。第三部分谈谈经济增长率和结构变化。第四部分对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并就今后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限制因素发表简要评论。本文有意略去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为，除农业部门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外，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试验阶段。虽然本文的重点

是论述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趋势，但是这些问题同微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为经济政策是根据领导人对微观经济发展的看法制定的，而经济发展趋势则反映出微观经济单位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

一、历史遗留问题

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领导人接手的是由于十年政治动乱和管理不善而深受破坏的经济。不过，到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经济情况已有所恢复。但是，新领导人在试图振兴经济的时候，仍然面临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为了便于分析，这些问题可分为同经济发展的四个主要根源有关四类，即土地质量和数量的变化、劳动力、资本以及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

(1) 中国最短缺的资源之一是可耕地。自一九五七年以来的二十年中，可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一，即从一亿一千二百万公顷减少到九千九百万公顷，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从而使人均可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到一九七八年农业劳动者的人均耕地面积已减到零点三公顷，而日本为零点七公顷，印度为一公顷，美国为四十八公顷。可耕地同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大大增加了提高耕地生产率的压力。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工厂、道路、军事设施、住宅建筑以及水利工程等占用土地。不仅耕地面积减少，而且由于生态平衡长期受到破坏，土壤质量也下降了。

(2) 同耕地短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劳动力数量充足。一九七八年，达到工作年龄的人总共有五亿二千八百万，其中三亿九千八百万已就业，但仍有大量劳动力待业。待业是劳动力供应量大增和需求减少的结果。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是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达到工作年龄。在城市地区，还有其他劳动力来源，如大约四百万中学毕业生要求就业，还有一九六六至七六年被送到农村，现今已返回城市的大约一千四百万青年。

估计一九七八年城市地区有一千万到两千九百万人失业，农村有四千万到九千万人失业。

城市出现就业不充分的现象，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奉行的既定政策是在只需要雇用三个人时，却雇用了五个人。农村也出现了就业不充分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剩余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

由于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力供应从来就不是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问题在于劳动力质量比较低。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劳动者中，文化程度仅达到或未达到初中水平的占百分之八十九，文盲占百分之二十八。

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

大学	0.9
高中	10.5
初中	26.0
小学	34.3
文盲或半文盲	28.3
总共：	100.0

科技人员特别少。一九七八年，这类人才总共只有四百三十五万，即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

(3)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资本设备大量增加。由于这段时间内资本投资数量大，因此到一九八〇年左右，工业和运输方面的固定资本设备的年限显然并不太长。但是大部分资本设备技术落后，急需更换。在工业部门，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设备达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水平，另外百分之二十的设备虽然技术落后，但运转仍然良好，百分之六十的设备早该淘汰或更新了。因此，维修费用增加，产品质量下降，单位产品耗能率较高。这种情况创造了用现代技术更新资本设备的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同时也带来了投资的巨大需求。

(4)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看，经济管理效率都极低。效率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过去二十年中产量净值与总值的比例一直不断下降，反映出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量增多。效率低的其他标志还有某些产品质量低，建设成本比过去高，建设周期比过去长，设备利用率低，库存量大等等。

总之，中国领导人在三中全会时所承继的经济是，农业增长缓慢、耕地减少、失业人员众多、技术力量极为缺少、资本设备多但技术落后、体制僵化而且经济效率低，结果是产量迅速增加，但既不能与最后需求结构相适应，又不能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多大作用。诚然，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十八点二。但是上述结构问题的消极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有利的发展因素的积极影响。中国领

领导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的。

二、新的战略发展

新的发展战略并不是三中全会直接提出来的，而是在党中央于一九七八年改组领导班子，并决定将注意力转移到实现经济现代化方面之后逐渐形成的。党中央举行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来重新研究过去的建设经验，制定处理目前种种问题的各种不同政策和为将来制定新方针。到一九八二年，已为今后二十年制定了长期目标和长期计划，并且将许多指导原则写入了第六个五年计划。

发展战略一般包括一系列目标和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拟定的行动方针，这些目标包括：实行机构改革，以促进和协调经济活动，采取有关动员和分配人力物力的措施以及选择发展的具体方法。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的发展战略不同于仿照斯大林主义模式而制定的、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的那个战略，也不同于此后执行的各种“毛主义战略”。新的发展战略的不同特点是：

(1) 过去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是使工农业总产值迅速增长，大幅度增加钢和粮食这样一些产品的产量。现在，新领导集团强调稳步增长，而不强调快速但不能持久的增长，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增加产量，强调在提高总产值的同时提高物质产品净值，并强调既要重视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经济增长。

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八五年)的指标主要是根据这些原则制定出来的，计划规定，物质产品净值和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均增长百分之四。宣传中也公开报道了另外两个目标：一是从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〇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翻两番；二是到二〇〇〇年为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从一九七九年的二百五十三美元提高到一千美元。这些目标中所包含的增长率确实不算低，但是，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的指标相比，那就低多了。无论如何，给一九八〇——二〇〇〇年规定的增长指标还是比一九八一——八五年的指标高得多，这表明，制定计划者希望九十年代的经济加速增长。

(2) 为了促使中国的劳动者为实现这些目标更加勤奋地工作，新领导集团给农场和工业企业下放一定的决策权力，以物质报酬代替思想鼓励，反对在收入分配方面搞平均主义，而主张工资有一定的差别，对